

前沿 LANYAN

经济观察

今年以来,金融去杠杆和防风险继续推进,并取得了初步成效。随着部分表外融资需求转移至表内,不少企业因资信等级较低,导致“融资难和贵”的压力增大。近期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降低企业融资成本。近日,发改委等四部门下发了《关于做好2018年降低成本重点工作的通知》,部署降低成本工作。

4月2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对银行普惠金融服务实施监管考核,确保今年实体经济融资成本下降。目前,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尚未得到有效缓解。一方面,小微企业融资需求持续攀升;另一方面,随着银行存款成本持续上升,以及监管日趋严格,表外融资回表导致银行资金成本向企业端传导,小微企业融资成本上升尤为明显。

多方发力降低成本 为企业融资“消肿止痛”

中间环节通过长

民营企业融资成本高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企业难以从银行直接贷款,获得贷款需要过多中间环节。

近年来,随着经济增长在增长率的下降,实体经济呈现出利润率下行、投资回报率下降趋势,如果融资成本长期高过实体经济回报率就会累积风险。目前,企业融资环境尤其是民营企业融资环境并不乐观。虽然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基准利率不高,商业银行公布的贷款利率都比较高,可是经过各个环节层层加价后,最后到达企业手里的资金价格却已经很高。

全国政协委员、光汇石油董事局主席薛光林表示,“从民营企业向银行融资的成本看,大型民营企业贷款年利率及其他收费一般需要12%,中型民营企业一般在16%至18%,小微企业在20%至25%之间。从多家到香港上市的小公司数据看,其平均贷款利率高达15%至20%。在全国范围内,民间借贷利率平均为23.5%。民营企业整体融资利率远远高于企业实际利润率,很多民营企业正常融资借不到钱,只能借高利贷”。

民营企业融资成本高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企业难以从银行直接贷款,获得贷款需要过多中间环节。一位业内人士举例说,一般银行贷款年利率仅为7%左右,走完信托等通道到企业手里时,利率可能超过10%。在走通道的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金融掮客”,他们帮金融机构找资金或者为其介绍项目,然后从中抽取中间费用。这些费用都会转嫁到融资企业身上。

曾在银行工作过的薛光林称,高利贷主要资金来源归根到底还是来自银行体系。“由于资金主要集中在几家大银行,几千万商家对应为数不多的大型银行,资金通过理财、信托等表内到表外环节流动,导致价格扭曲。一些信托公司、租赁公司、国有企业财务公司、村镇银行、典当行、小贷公司甚至成了倒钱工具。”他说。

“虽然国家一再强调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鼓励大中型银行特别是有大型银行设立普惠金融部,但在实际业务中,有一些关系企业拿到相关资金,手一放就放高利贷。在对商回报重视程度越来越高、信贷绩效考核



把降低成本进行到底

越来越严的情况下,银行不愿意给中小微企业、制造业企业、劳动密集型加工企业增加贷款。”薛光林称,已在今年全国两会上提出建议,在银行体系彻底清查信贷资金的流向,打击各类金融掮客,关闭形形色色的表内表外资金通道。

贷款中间环节费用高

部分融资担保机构在给企业提供担保业务时,存在保费、保证金过高等问题,增加了企业的融资成本。贷款中间环节的费用也增加了企业融资成本。部分融资担保机构在给企业提供担保业务时,存在保费、保证金过高等问题,增加了企业的融资成本。

江苏泰州银监分局调查发现,中间费用过高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中小微企业发展,不利于企业转型升级,亟待引起关注。调查数据显示,2018年2月末,江苏省泰州市银行业中小微企业表内外授信余额670.9亿元,同比下降11.1%,2018年1月份至2月份,泰州市银行业中小微企业贷款加权利率为6.23%,同比上升0.15个百分点。

泰州银监分局相关工作人员称,在具体业务中,银行中长期贷款一般需要发改委立项批复、可行性研究报告等材料,但中小微企业普遍投资

小额小、内部管理机制不健全,难以达到授信条件。分局走访的泰州市3家中小微企业制造企业因“产需要新建厂房,考虑到邀请外部机构出具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成本至少几万元至几十万元,因而企业往往不愿意申请中长期项目贷款,转而向短期流动资金贷款。

贷款授信流程繁琐也影响企业融资。泰州银监分局举例称,近年来地市级二级分行的授信审批权限不断被下放,授信审批链条拉长。当地银行反映,目前中长期项目贷款的审批权限上收至省分行或总行,审批流程繁琐,不符合中小微企业“短、频、快”的信贷需求。

泰州银监分局建议,可以简化中长期贷款审批流程。适当将部分中长期项目贷款审批权限归还地市级二级分行,适度降低审批门槛,调动和发挥基层分支机构支持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的积极性。同时,强化国有背景担保体系建设。建议政府部门牵头发展一批经营规范、信誉较好、服务中小微企业的政策性融资担保机构,降低反担保要求,实行政策性担保费率,缓解中小微企业担保难题。

多方发力降低成本

需要在正面激励方面采取更多措施,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小微企业的支持,并保持商业可持续性。

商业银行也有着自身考虑。成本与风险“双升”推高了企业信贷利率。一是内部资金定价水平提高。受市场资金价格持续走高、银行负债成本攀升的影响,商业银行内部资金转移定价水平提高。以江苏泰州为例,多家银行分支机构反映上级行2017年以来连续上调FTP(内部资金转移定价),每次上调5至15个基点,2018年2月份其内部转移定价同比上升约50个基点,不得不提高贷款利率。二是信用风险持续高企,2018年2月末,泰州市中小微企业不良贷款余额24.5亿元,同比增长19.3%;不良贷款率5%,同比攀升1.3个百分点。部分银行选择进一步提高中小微企业贷款利率,以抵补攀升的信用风险。

中国人民银行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董希淼认为,需要在正面激励方面采取更多措施,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小微企业的支持,并保持商业可持续性。减少贷款中间环节,降低利息之外的费用,银行需要加大创新。比如,推出“一次授信,循环使用”“免还续贷”等新产品,新服务,减少因“过桥”“倒贷”等问题给小微企业增加额外成本。

此外,还应针对小微企业资产少、财务报表不够规范等问题,创新贷款担保方式。一方面降低抵押担保要求而增加的成本,一方面降低企业互保带来的融资成本。比如,国务院和各地地方成立专门融资担保基金,为小微企业融资提供担保,就是很好的措施。当下,应加快推进相关政策落地实施,惠及更多的小微企业。”董希淼说。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丁志杰认为,如果把金融比作江河,河道疏通仅靠减少中间费用,即通过“下河道疏通”并不能解决全部问题,还需要从源头解决企业融资难问题。在金融系统,上游是根本。在中国金融体系30多万亿元基础货币中,有22万亿元是银行存款准备金。巨额存款准备金是过去对冲外汇储备增加导致货币被动投放所形成的。存款准备金是商业银行的资产,也是商业银行乃至金融体系的负担。商业银行要通过信贷把这些成本转嫁出去,最终承担者是实体经济,所以造成了“钱多钱还贵”这一不合理的现象。这需要有序降低存款准备金率。”丁志杰说。

据《经济日报》

提示:

截至目前,共有24.46万户纳税人完成环保税纳税申报。企业既算经济账又算环境账。环境保护税对直接向环境排放污染物的行为征税,覆盖4类主要污染物,100多种主要污染物因子。鼓励清洁生产、鼓励集中处理、鼓励循环利用是环保税的3个政策导向。

环保税“撬动”企业绿色生产 改革效益已初露端倪

“环境保护税作为专门的绿色税种,其开征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主要是为了让企业既算经济账又算环境账,高排放企业加速绿色转型,让清洁生产的企业获得发展先机。”5月10日,国家税务总局财产和行为税司司长蔡自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今年1月1日,环境保护税法正式实施。按照税法规定,环保税是按季申报,4月1日进入环保税的首个征期。截至4月18日环保税首个纳税申报期结束,全国共有24.46万户纳税人顺利完成环保税纳税申报。剔除一些法定不需申报情形,基本实现了申报尽申报,共计申报应纳税额66.6亿元,扣除申报减免税额22亿元后,实际应纳税额44.6亿元。“因税款入库还未结束,这个数字不是最终入库结果。总体看,与去年一季度排污费相比实现了平稳增长。”税务总局财产和行为税司副司长刘坤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环境保护税对直接向环境排放污染物的行为征税,覆盖了大气污染物、水污染物、固体废物和噪声4类主要污染物,100多种主要污染物因子。“我们也查阅了有关资料,目前来看,我们的环境保护税是世界上覆盖面广且作用直接的环境保护税。因为国外有些单行环境保护法没有覆盖我们这么多污染物,也没有这么多污染物因子。有些是对碳排放征税,不是直接的,我们是对污染物征税,所以覆盖面广、作用更直接,这进一步树立了我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蔡自力表示。

从首个征期的情况来看,环保税起到了哪些积极效应呢?孙群举了一个例子。河北一家企业2017年投入1000万元改造废气处理设备,今年一季度该企业排放的3个主要污染物因子: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烟尘的排放量较去年同期分别下降了44.6%、26.4%和26.8%。因为排放量下降幅度较大,排放浓度低于国家和地方标准30%以上,该公司又享受了税收优惠,今年一季度缴纳环保税约28万元,较环保投入治理改造前少缴约50万元税款,1年就会节省200多万元税款,5年左右就能收回环保投资治理成本。

从环保税首季相关数据和典型案例来看,环保税撬动了节能减排、引导绿色生产,促进高质量发展的改革效益已初露端倪。另外,环保治理的投入力度也在增加。某地企业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企业的环境治理投入新增了大约60多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以上。

“在制度上,环境保护税主要是通过构建两个机制来更好地发挥税收调节作用。”蔡自力介绍,一是“多排多征、少排少征、不排不征”的正向减排激励机制。一方面,针对同一污染物污染因子,按照排放量来征税。另一方面,针对不同危害程度的污染因子,设置了差别化污染当量值,实现对高危害污染因子多征税。二是“中央定底线,地方可上浮”的动态税额调节机制。环境保护税法规定应税大气污染物、水污染物税额的上下限和税率,授权省一级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本地区的承载能力和承载能力,在上限和下限之间提出具体的适用税额,报同级人大常委会决定,并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备案。

鼓励清洁生产、鼓励集中处理、鼓励循环利用是环保税的3个政策导向。比如,纳税人应税大气或水污染物排放浓度低于规定标准30%的可以减按75%征收;纳税人排放浓度低于规定标准50%的减按50%征收。

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向依法设立的污水集中处理、生活垃圾集中处理场排放应税污染物的不缴纳环境保护税。依法设立的城乡污水集中处理、生活垃圾集中处理场相应应税污染物不超过国家和地方规定的排放标准的,暂予免征环境保护税,鼓励集中处理和达标排放。此外,纳税人综合利用的固体废物,符合国家和地方环境保护标准的,暂予免征环境保护税。

据新华网

财政部:撬动更多金融 和社会资本投向农业农村

农业农村部、财政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做好2018年农业生产发展等项目实施工作的通知》。通知称,通过项目实施,进一步创新财政支农体制机制,提升财政资源配置效率。此外,进一步创新和完善资金管理使用机制,深入推进财政支农专项转移支付资金统筹整合,全面实施“大专项+任务清单”管理方式,继续按照“放管结合、效益为先”的原则,下放资金使用管理权限,科学合理确定任务清单,提高省级部门统筹使用资金的能力和空间,确保中央宏观调控与地方自主统筹平衡兼顾,切实提高政策的精准性、指向性和有效性,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通知指出,坚持绿色兴农、绿色兴农。全面落实以绿色生态为导向的农业补贴制度改革方案,切实保护耕地、草原和农村生产资源,强化农业生态环境治理,支持绿色循环立体农业发展,加快形成农业绿色生产方式。

通知称,持续优化财政支农投入供给。健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财政投入保障制度,创新资金投入机制和使用方式,进一步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加快建立涉农资金统筹整合长效机制,深化“大专项+任务清单”管理方式改革,完善资金使用管理机制,全面建立绩效评价制度,强化结果运用,体现权责对等、放权和责任相结合。充分发挥财政资金引领作用,因地制宜推广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政府购买服务、贷款贴息等方式,撬动更多金融和社会资本投向农业农村。

据《经济参考报》

快评 KUAIPIING

“高铁站建在中心城区”是合理纠偏

国家发改委等四部门印发《关于推进高铁站周边区域合理开发建设的指导意见》,要求合理确定高铁车站选址和规模。新建铁路站场应尽量减少对城市的分割,新建车站选址尽可能在中心城区或靠近城市建成区,确保人民群众乘坐高铁出行便利。高铁车站建设要规模适度、经济适用,切忌贪大求洋、追求奢华。

目前各地高铁站大都兴建在郊外,距离中心城区太远,市民乘坐高铁时,往往需要提前一两个小时出发赶往高铁站,不仅耗时费力,大费周章,增加了出行成本,也令高铁的便捷性大打折扣。此次四部门联合发文明确“高铁站建在中心城区”,乃是对当下高铁站选址方案的合理纠偏,督促高

铁站建设回归到便民轨道,以发挥高铁的高效便捷优势,降低广大高铁旅客的出行成本。

高铁以其高速、安全、平稳、准时、舒适等优势,在中短途出行市场里,具有强大的市场竞争力,获得了认可,也改变了很多人的出行模式。如今,高铁已经初步形成,支线路在全中国开花,各省省都在积极争取引进高铁线路,以搭上“高铁快车”跟上发展速度。不过,部分地方将高铁项目视为扩大城市区域面积,开发新区、远郊房地产的契机,有意将高铁站设置在远离中心城区的位置,导致便民沦为不便。

从现实情况看,时下很多地方的高铁站处于偏僻地带,附近人口稀少,配套设施匮乏,交通极为不便,令市民去高铁站花费的时间太长,甚至比坐高铁出行的时间还长,简直是黑色幽默。而且,从中心城区到高铁站,缺乏方便的交通工具,公交线路较少,耗时打,打车贵,开车则要承担油费、停车费、过路费等,出行成本陡然上升,而大幅度削弱了高铁的性价比。

高铁确实能够带来大量的客流量,提高交通出行效率,催生巨大的商机。各地政府正是基于对高铁的这种认知,才试图因利而为搞投机,通过导入客流,以点带面,将城市新区、偏僻地带带起来。可是,梦想并非都能变成现实,高铁站能否带动一片区域,需要遵循市场规律,不能只看客流量,还有很多其它市场因素共同决定。

据新华网